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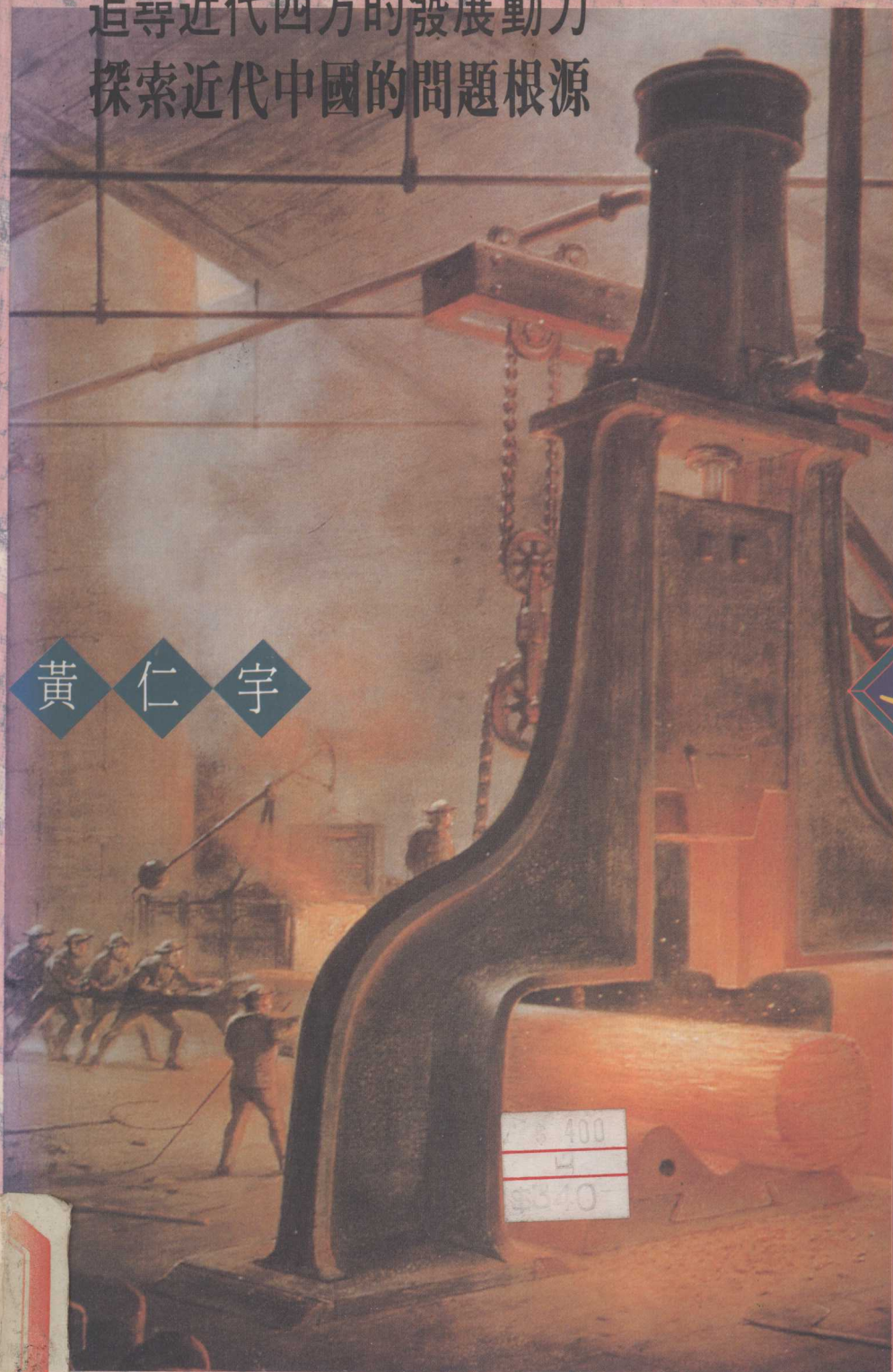
追尋近代西方的發展動力
探索近代中國的問題根源

資本主義

與

廿世紀

黃 仁 宇



「資本主義」的名實，歷來言人人殊。本書不作抽象觀念與意識形態上的爭論，純從技術角度與事實層面著手，根據西歐、北美、日本的經驗事例，分析討論資本主義初起的生產與經營方式，以至其導致社會、經濟、政治全面改觀的具體歷史演變過程，而澄清作為牽連廣泛的「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的資本主義現象的精神風貌。

這是一部資本主義生理發育史，體大思精，書法獨步中文與世界學術界。

全書並以「中國本位」命意，回顧與前瞻並重，為中國的過去與未來提供意義深重的意見。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知識界雖然人人熟悉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但是資本主義究竟在歷史上是怎樣發生、成長和變化的，則很少人有親切的認識。我們對於這樣重要的一個概念竟缺乏基本的知識，正是因為中國史學家在這一題目上完全交了白卷。現在這個缺陷已由作者填補起來了。

余英時〈序〉

NT \$400

ISBN 957-08-0714-8



9 789570 807141

D6

012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黃仁宇 著

1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A55069·
80.11.1158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初版第六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定價：新台幣
精裝500元
平裝400元

著 者 黃 仁 宇
發 行 人 劉 國 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3620137·7627429
郵撥電話：641866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713-X (精裝)
ISBN 957-08-0714-8 (平裝)

序

余英時

黃仁宇先生（以下簡稱「作者」）近幾年來發憤研究資本主義在西方各國發展的歷史，寫成了這部《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的巨著。這是最值得史學界重視的一件大事。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知識界雖然人人都熟悉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但是資本主義究竟在歷史上是怎樣發生、成長和變化的，則很少人有親切的認識。我們對於這樣重要的一個概念竟缺乏基本的知識，正是因為中國史學家在這一題目上完全交了白卷。現在這個缺陷已由作者填補起來了。

作者這部書有三個重要的特色：第一是對於資本主義的觀念作了適當的澄清。作者檢討了二十世紀有關資本主義的許多重要的理論，並指出其不足之處，使我們瞭解這一歷史現象的複雜性，不是任何現有的理論所能概括得盡的。這一點得到澄清之後，作者便引導我們進入本書的第二個特色，即根據西歐與北美各國的具體事例，分別討論資本主義的生產與經營方式的演變過程。這是本書的主要部分，作者是史學家，他不能安於抽象的原則，而必須把資本主義放在歷史的處境中，以取得具體的理解。資本主義雖然是經濟制度，但是它影響及於整個社會體系的運作。作者同意法國年鑑派史學巨匠布勞岱（Braudel）的見解：「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成為國家。」「新的交換方式產生動搖的力量……每一個社會受此衝擊，都會出現『歷史性的』的新頁。」因此作者認為把握歷史的動態是認識資本主義的一個最重要

的途徑，他說：「資本主義之展開既在各國產生劇烈變化，則研究資本主義之專書應當根據其衝突的情形分國論列。」我完全贊同作者這一史學的取向。最使我詫異的是：作者廣泛搜集參考資料的結果，僅發現一部通論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著作，而且還是六十年前出版的，可見本書不僅在中國史學上為創闢之作，即在西方也久已絕響。我相信，將來此書的英文版問世也一定能引起西方讀者的深厚興趣。

本書的第三個特色是作者所謂「以中國為本位的考慮」。作者下筆之際隨時考慮到此書的主旨怎樣能和中國以往的歷史和未來的發展發生有意義的聯繫。就這一點說，本書並不是一般性的資本主義通史，而是特別為中國史學界設計的專著。所以本書在導論部分特別討論了韋伯的論點，並進一步對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問題提出了深刻的觀察。這是韋伯在《中國宗教》一書中所首先提出但未能充分解答的重要題旨。本書最後一章更詳引宋代以來的史實，說明中國傳統的政治社會結構為什麼特別不容易接受現代化的改變，以致形成了一個「長期革命」的過程。作者對於這一歷史過程的艱難有獨特的灼見，這在他的英文本《中國的大歷史》以及其他中文論著中有更詳細的發揮，讀者宜兼觀並覽，以明作者的苦心孤詣。對這樣帶有根本性質的大問題，當然不可能祇有一種意見，史學家之間難免有見仁見智之異。但作者之說確有理據，足成一家之言。

本書以《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為書名，其命意自然是預期資本主義在下一個世紀將可能與整個中國發生聯繫。作者不取唯物史觀的五階段論，而視資本主義為西方特有的產物，這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如果我沒有誤解作者的意思，作者似乎認為資本主義是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移植到中國的。但是作者對資本主義的內外限制也提出了明確的批評，因此他又似乎主張社會主義的某些原則足以濟資本主義之不足。這種態度是比較開放的，沒有一點武斷的意味。作者討論資本主義的著眼點是技術層次的；他基本上避開了意識形態的問題。所以他強調資本主義有「超越國界的技術性格」。他把技術性格歸納為三點：資金的廣泛流通

(wide extension of credit)、超越個人關係的經營方式(impersonal management)，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的通盤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從這一技術觀點來說，資本主義和現代化幾乎是同義語。技術是工具理性的產品，對一切價值都是中立的。這是作者主張資本主義可以而且必須引進中國的主要根據。作者一向持有一個特殊的觀念，即中國傳統的社會體制是不能以嚴格的數字管理的，而資本主義在他看來則恰恰提供了以數字管理的可能。能不能以數字管理，似乎是作者劃分「傳統」與「現代」的一項最重要的標準。

作者對中國現代化的關懷是十分迫切的。這一迫切感使他把中國近代的「長期革命」看作一個曲折迂迴、痛苦，但逐步接近現代化的進程。他斷定國民黨「創造了一個高層結構」，而共產黨則「創造出一個低層結構」，便是最明顯的例子。作者對歷史的進程不取任何決定論的觀點，但是他相信超個人的力量(impersonal forces)一旦形成運動以後，便有自己的進行的軌道。這種看法當然也建立在一定的預設(assumptions)之上。我可以指出兩個預設：第一是歷史的客觀性，歷史的進程主要是由集體的客觀力量推動的，不受少數個人的主觀願望的支配。第二是他一再提到的「歷史的長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例如資本主義的興起在他看來便是「歷史的長期合理性」的產物。因為作者有這些預設，所以他論史不尚「褒貶」，而注重客觀的可行性，史學的功能便在於指示長期的客觀發展的合理方向，及其內在的因果關係，使人——特別是在歷史舞台上扮演主角的人——能看清「他們自己在歷史上的任務」，而知所抉擇。「長期的合理性」也是作者對中國的前景仍然保持著樂觀的主要理由。客觀主義的歷史觀則使作者避開了一切價值判斷，而對中國大陸所採取的政策盡量予以客觀主義的（也可以說是最理性、最善意的）解釋。我們無論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學預設或同意他對於具體事件的解釋（包括十年改革和天安門悲劇），我們都不能不對他的知識真誠和故國情深表示一種同情。這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正是作者的理智和情感交織而成的作品。

現在我想利用這個機會簡略談一談我自己對資本主義問題的看法。首先我願意指出，本書作者對資本主義所採取的肯定態度，雖然其著眼是在技術層面，卻透露出近四十年來史學家在觀感上已有重大的轉變。1951年在法國公開的一次關於資本主義的史學研討會上，英國的經濟史家艾施頓（T. S. Ashton）指出，一般經濟史家處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位置，往往出之以指斥的態度，他們首先根據恩格斯《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說明工人階級怎樣因現代工廠的出現而陷入悲慘不堪的生活境地。宋巴特（W. Sombart）和熊彼得（J. Schumpeter）等名家都強調資本家追求利潤的貪得無饜和工人階級的日益貧困。所以資本主義僅有利於資本家而帶給工人的則祇是無窮的苦難而已。雖然具體的史學研究早已證明這種說明與事實不符，工業革命也改善了勞動者的生活品質，但一般史家對資本主義的憎恨並不因之而有所改變。（最近約翰遜在《知識分子》論馬克思的一章中則指出恩格斯《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所根據的資料事實上是英國官方的調查報告，有些情況已經改變了，而恩格斯仍依之立論；見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1988）。在同一討論會中，美國經濟史專家海克爾（L. M. Hacker）則撰文論美國史學家的「反資本主義的偏見」，他特別著重地指出畢爾德（Charles A. Beard）在這一方面的重大影響，畢爾德抱著童年在印第安那農業社會所培養出來的成見，從道德的立場上排斥資本主義，但是他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歷程及其在美國經濟成長方面的重大貢獻卻並未作過深入研究。後來受畢爾德影響而治經濟史的人則更進一步控訴資本家的重大「罪行」。他們說美國大資本家根本是「強盜貴族」（Robber Barons），其財富是由欺詐獲得的；這些資本家在經營的過程中掠奪了美國的所有天然資源；私有財產的社會後果是階級不平等、農業退居次要，以及貧民窟的大量出現等等。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在歐洲和美國史學家的筆下一直受到最不公平的待遇，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多數抨擊資本主義的史學家同時也必然是嚮往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例如熊彼得便曾公開宣稱：「資本主義社會將不可避免地趨於解體，並從而不可避

免地為社會主義的社會所取代。」（Ashton和Hacker兩文皆已收入F. A. Hayek, ed.,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四十年前西方史學家對資本主義的偏見之深如此。但是這種偏見在五〇年代以後不但沒有消失，還普遍地加強了。這是由於一方面知識分子鄙視商業的心理源遠流長，另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以來社會主義理想的吸引力始終不衰，直到最近十幾年，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真相完全暴露了出來，大多數知識分子（包括史學家在內）才開始改變了看法，資本主義不再被看成萬惡之源了。

這裡我們有必要澄清一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在二十世紀人的心目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似乎是兩種不同的經濟制度，可以由我們自由選擇。一般人即使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而肯定社會主義將必然取代資本主義，也不免以為這兩種制度各有優劣，取捨之間甚費斟酌。至於知識分子，基於公平原則的考慮，則多數傾向於社會主義。我覺得我們應該分辨兩種不同的社會主義：一是馬列主義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一是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前者以暴力革命取消私有財產，實行全面計畫的經濟制度；後者採用議會民主的方式實行有限度的計畫經濟，但並不沒收一切私人財產。民主社會主義曾在英、法、北歐諸國以各種不同的程度出現。美國雖然沒有實行過民主社會主義，但它的累進稅制和社會福利政策也體現了民主社會主義的一部分的精神。以公平分配的原則而言，民主社會主義對現代文明的發展確有重大的貢獻。但是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以暴力革命沒收一切私有財產的結果是所有生產資料都控制在一個最具獨佔性而且全面專政的「黨組織」的手上。這個「黨組織」不但是唯一的封建領主，並且是唯一的大資本家，由於這個「黨組織」壟斷了所有的財富和權力，於是形成了一種祇有政府而沒有社會的局面。在西方而言，這是消滅了「公民社會」，在中國而言，也是消滅了「民間社會」。由於私有財產廢除，每一個個人都失去了自由和尊嚴，他們必須在「捧人的碗，受人的管」的狀態下向

「黨組織」討生活。社會力量既不存在，「黨組織」成了不受任何約制的怪物。在五十年前，祇有蘇聯一國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蘇聯的真相又不為外人所知；即使偶有真實的報導，由於知識分子普遍地同情社會主義，也無法取信於世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其內情已很難盡掩。但是最近幾年來，特別是1989年以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幾乎在一夜之間全部崩潰，蘇聯大帝國也面臨經濟破產和政治瓦解的邊緣，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才開始在知識分子之間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今天我們已看清了以暴力革命建立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這樣的「社會主義」是不能和資本主義相提並論的。資本主義誠然是西方文明的特有產品，然而它是在長期歷史的進程中，通過各種特殊因素的配合，自然而然的出現的。誠如本書作者所言，它是「歷史的長期合理性」的產物。這與以暴力建立並永遠以暴力維持的「革命社會主義」恰好背道而馳，後者是文明的一大逆流，是少數現代知識分子的狂妄的結果。為什麼是「逆流」？因為私有財產是文明的基礎，每一個個人都有足以保障獨立生活的私產才是文明的極致。所以一切文明的社會，包括初民社會，都以不同的形式建立了私有財產的制度。西方現代的資本主義不過是把財產權建立在更精密的法律系統之上而已。中國的孟子強調「有恆產者有恆心」，強調「仁政」必須「為民制產」，也早已道破了文明的奧秘。為什麼說是「狂妄」？文明的秩序是無數複雜的因素，通過幾千年的歷程，逐漸演進而成的。最近海耶克（F. A. Hayek）在*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的新著中分析市場的出現和成長，已展示得很清楚。其實何止市場，一切文明秩序的出現和發展也無不如此。除非是上帝，人的智力再高也不能憑空設計並創造出一個文明的秩序。現在少數知識分子竟要做祇有上帝才能做的事，這豈不是「狂妄」？不但海耶克如此說，科學哲學家涂爾明（Stephen Toulmin,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The Free Press, 1990）和思想史家柏林（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Alfred A. Knopf, Inc., 1991) 分別討論全面「破舊立新」和西方烏托邦理想的興衰，也都不約而同地得到與海耶克相似的結論。總之，文明秩序祇能局部改進，不能徹底摧毀了之後重新設計重造。這也是司馬光所說的，舊房子如果還能勉強居住，不必拆了再建。

我並不認為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使我們十分滿意的制度，更不敢說它可以原樣不動地照搬到中國或其他非西方地區。如果說日本已成功地移植了資本主義體制，我們也必須承認日本的「資本主義」仍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與美國顯有不同。但是中國大陸如果想重回文明的正流，首先必須恢復文明的基礎——私有財產，至於是否必須轉化為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反而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

1991年7月4日於台北旅次

目 次

序.....	余英時	i
第一章 問題的重心.....		1
第二章 威尼斯.....		37
第三章 荷蘭.....		87
第四章 英國.....		127
第五章 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		187
第六章 美國、日本和德國.....		265
第七章 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		333
第八章 總結.....		451
參考書目.....		483
索引.....		505

第一章 問題的重心

「資本主義」是一個常用的名詞，不時出現於眾人筆下和口語之中。可是要給這名詞適當的定義，則非常困難。不僅各種書刊作者堅持己見，即使我們引用到「資本主義」這四個字，也可能前後用意不同，更害怕旁人頓生誤解。這問題若不得澄清，則可能成為社會上思想衝突的根源，亦可能影響到各個人的人生觀，使我們對世事惶惑而覺得沒有主宰。

以一個常用名詞而會產生如此多問題，大概因為資本主義在世界上牽涉的地區廣泛，歷時久遠，迄今尚未停頓，且又與現代生活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近世紀中主要的戰爭與大規模的動亂，通常都與它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資本主義，既可以當作快樂與新生命之原動力，也可以視為許多失望與災害的淵藪，因而我們無法在理智上或情緒上漠然視之。

雖然一般作家認為資本主義形成一種經濟生活的現象，首先在十三至十四世紀之間出現於義大利半島，可是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卻產生在幾百年後。縱然如此，從開始使用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以今日世事變化之劇之速，也可以算得「曾經滄海」。對西方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因為1929年經濟恐慌的記憶猶新，各界批評資本主義的文字很多，組織工會，防制托拉斯，提出社會福利的立法，亦與當日提倡資本主義者的立場相反。直到東西冷戰之後，才有人以在資本主義的旗幟下自豪，才有人倡說它與西方社會中之自由不可分割。可見得歷史上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複雜的多面體。



1929年全球發生經濟大恐慌，街頭到處是失業的人，因此後來才有防制托拉斯和社會福利立法等措施，卻都遭到當時提倡資本主義者的反對。

資本主義——名目之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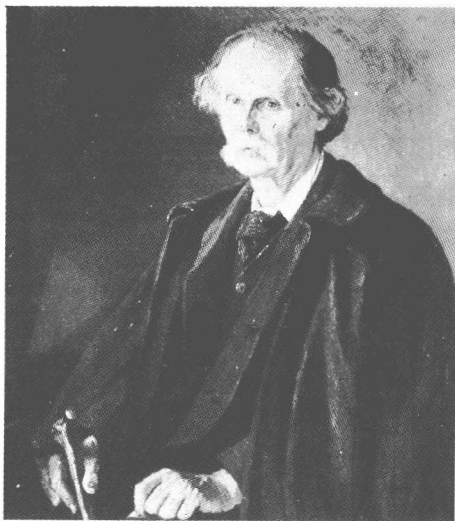
法國歷史家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研究資本主義多年，他的考證如下：

資本主義為這三個名詞〔其他兩個名詞為「資本」（**capital**）及「資本家」（**capitalist**）〕之中最帶激動性的一個，曾經促使歷史學家及辭典專家拚命追究而尚無定論。據陶查特（**Dauzat**）說，此字眼曾見於1753年之《百科全書》，它並賦予奇特的意義：「富裕之人的景況。」這種說法可能不正確，因為此文句迄今未為後人覓得，僅見於1842年黎察（**J.B.Richard**）所著《新法文廣義》（*Enrichissement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一書中。可能是由於布蘭（**Louis Blanc**）與巴斯夏（**Bastiat**）的爭辯，才賦予這名詞新意義。他在1850年寫著：「我所謂之資本主義乃是有些人撥用資本，不讓旁人介入。」當時「資本主義」這字眼仍不常見。普魯東（**Proudhon**）間或使用。他的說法亦算正確：「土地仍是資本主義之堡壘。」這也是他的主要論題之一。普魯東給這個

名詞下了很好的定義：「一種經濟與社會之體制，當中勞工以勞力使資本產生作用，使之成為收入之來源，而此資本並不隸屬於這些勞工。」可是六年之後（1867）馬克思仍不知有此名目。

事實上要到二十世紀之初，「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才在政治論壇的爭辯中，轟轟烈烈的被視為社會主義的反面。宋巴特（Werner Sombart）爆炸性的著作《現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初版，1902），更將之引進學術界。在很自然的情況下，這個馬克思從未使用的名詞，卻被歸併於馬氏的規範之中。自此，奴隸社會、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被視為《資本論》作者的三階段之演進。

這名詞在出現過程中的含糊不清，可能是由於它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名目。廿世紀初年，經濟學家長期的拒絕使用，如紀德（Charles Gide）、康瓦斯（Canvas）、馬歇爾（Marshall）、西利格門（Seligman）、卡薩爾（Cassel）。直到第二次大戰之後，才在《政治學辭典》（*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中出現；《大英百科全書》遲至



資本主義一詞的含義經常含混不清，因此長期遭到經濟學家如紀德（左）、馬歇爾（右）等拒絕使用。

1926年版才賦予一篇解釋。《法國研究院辭典》則遲至1936年才加以介紹並給它一個啼笑皆非的定義：「資本主義：資本家之整體。」這書至1958年仍未有顯著的改進：「一種經濟體制，內中生產的品物屬於私人或私家行店。」——為甚麼不逕稱「生產工具」？

事實上自廿世紀初年以來，資本主義即被重重堆壓著不同的意義，而尤以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更盛，曾使很多人感到尷尬。有聲望之歷史家如希亞通（Herbert Heaton）曾提議將之廢棄不用。他曾說：「在各種主義之中，最擾亂聽聞的乃是資本主義。這字眼有了如此五花八門的解釋與定義，任何人都可以說，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相似。」費伯微（Lucien Febvre）認為它既然被過度濫用，實應自此放棄。可是如果我們真的放棄，又必立刻感到悵然若失。商非德（Andrew Shonfield）說得好：「還在繼續使用資本主義這個名詞的原因之一，是沒有人，最嚴峻的批評者在內，得提出個較好的字來代替。^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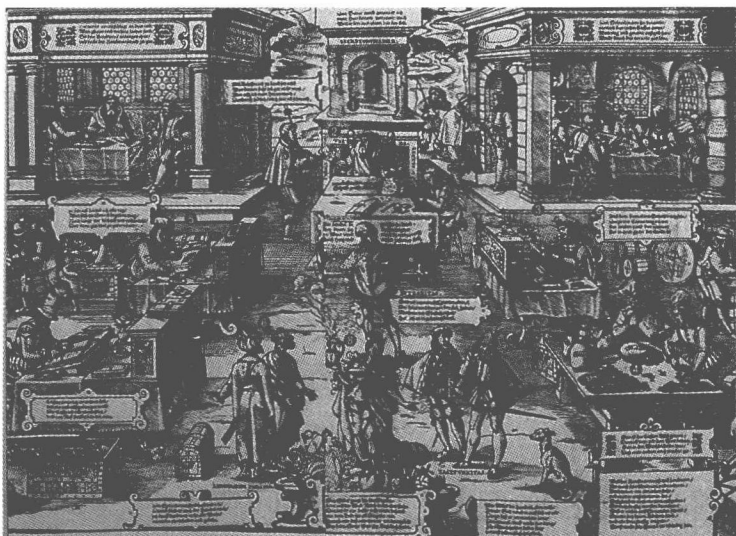
由此我們可以窺見這名辭之發生問題，其來有自。

陶蒲的三種學派

前劍橋大學講師陶蒲（Maurice Dobb）分析當代有關資本主義之論文，歸納為三派^②。一種注重生產關係之轉變。資本主義一行，生產者開始出賣勞動力，此後對製成品無法過問。這也就是馬克思學派。陶蒲自稱屬於此派。第二派著重資本主義的精神，亦即新時代的資本家將存積資本當作一種高尚的事業，並且賦予以虔誠的宗教性。還有一派則重視自然經濟蛻變為金融經濟的過程。資本主義之特徵，組織上本就預備對付遙遠的市場，於是批發商出資墊買商品，因之也干預著零售商及生

①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II, *The Wheels of Commerce*, trans. by Sian Reynolds. (New York, 1979), pp.237-38.

②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63), pp. 4-8. 我將作者的次序前後更動以適應我行文的安排。



16世紀的歐洲商社，商人們累積資本，同時也逐漸發展出類似今日銀行的複雜組織。圖中左右上方的商人正在洽談融資問題，①是金庫，②是出納主任，③是帳簿科，④是鑑定科，⑤為出納科，⑥是仲介人，⑦是負責快遞事務的專差，正中下方，⑧則是象徵帶來好運的幸運女神。（日耳曼國立博物館藏）。

產者的業務。

但在現有的著作中，沒有一派的理論可供我們全部觀摩借用。因為許多理論並不合於我們所處的時間及地點，對一般讀者說來，沈緬於這些理論可能始終不得要領，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例如陶蒲提及工業資本之形成時，承襲馬克思的說法，指出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匠工擴大了本身行業的製造。他們胼手胝足掙積了資本成為資本家，開始僱用勞工，創造新局面，通常是前進的。另一種方式則是將商業資本投入製造，壓制生產，使物以稀為貴，而大規模的賺錢。他們也不願意高度的分工合作，於是避免了大量的投資，總之就是反動。作者根據英國在十六、十七世紀間不同的行業，提出無數例證^③。但是

^③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pp.123-133.